



第七章

劳动者的跨国移徙

前两章关于城乡生活境况的论述表明，在发展中国家的很多地区，季节性、循环性、临时性以及永久性人口流动，已经成为人民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收入状况不断恶化的很多人来说，移徙将为自己和家人带来生存的希望或是更好的生活。这其中包括季节性移徙，在某个城镇或城市长期逗留，甚至永久定居下来，以期找到比农村地区报酬更高的工作。此外还有一种人口迁移情况——劳动者跨越国际边界，寻求赚钱的机会。

人们通常认为，国际移徙几乎总是从贫穷的国家向更富裕的国家迁移。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如今的移徙劳动者当中包括具有各种技能的工人，移徙的目的地日益多样化。很多移徙现象发生在工业化国家之间。¹ 劳动者移徙现象的这种多样化，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劳动力划分系统，种族、移徙地位和性别都可以成为划分标准。² 近几十年来，不同地区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日渐扩大，³ 我们因此有理由认为，短期和长期的人口移徙现象一直在不断增加。

近年来，工人的跨国移徙现象已经引起了政策的极大关注。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由于目的地国家出于政治考虑，出现了排外情绪；另一项原因是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正在经历人口老龄化过程，人的寿命延长了，对护理经济便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才和技能的外流让发展中国家不堪重负，这种现象也让人忧虑。来源国对于散居海外的本

国侨民及其汇款所产生的裨益，开始显示出日益浓厚的兴趣；有多项计划对此给予支持，比如国际移徙组织发起的“移徙促进非洲发展”倡议。⁴ 全世界海外侨民每年汇回本国的款项大约为 1 亿美元，他们以这种方式推动整个经济顺利运转。⁵

在上述种种情况以及在其他一些情况下，移徙过程都产生了性别影响。按照性别划分的人口流动方式，往往能够反映出劳动力的性别划分是如何纳入不均衡的经济发展进程的。⁶ 对移民的歧视，再加之种族不平等和性别不平等，使得移徙妇女“身处三重劣势”，一些边缘性、不规范和报酬低的工作往往都是由这些移徙妇女承担。与此同时，移徙浪潮——无论是女性独自迁移，还是同男子一起迁移——有可能重塑性别关系，改变权力不平等的现状。改善生活、摆脱此前受压迫处境的机会终于出现了。

但是，新的脆弱性也随之出现了。移徙者身处陌生的环境，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可能受到剥削和虐待，他们自身社会网络的种种规范可能受到破坏，有很多家庭分崩离析。一方配偶或者双方都迁移到其他国家（夫妻有时在一起，有时各奔东西），对于留在国内的孩子会造成不良影响，还可能导致永久性的家庭破裂。⁷ 性传播疾病的感染风险也会增加。移徙工人的艾滋病毒感染率往往高于非移徙者，而且同原籍国以及目的地的艾滋病毒流行情况无关。墨西哥、塞内加尔、厄瓜多尔和加纳东南部的情况就证实了这一点。⁸

方框 7.1 名词解释：“非法”、“无证件”、“非正规”

没有证件和没有工作许可证的移徙者通常被称为“非法”移民，这其中似乎有犯罪的含义，因而会造成误解。很多研究显示，致使移徙者的地位介于合法和非法之间的原因有很多，而这些原因往往是移徙者本人无法控制，甚至是不了解的。“没有证件”一词比较贴切，但不包括那些以合法方式进入目的地国家、但后来又违反其最初入境签证的人员。1999年在曼谷召开了国际移徙问题学术研讨会，21个与会国家一致同意采用“非正规移徙者”这一定义。这个术语自此开始得到广泛使用。

国际移徙流

在全球各个地区，为寻找工作和赚钱机会的人口流动状况日益增加，相关政策问题也已经相应列入了各国的政治议程。在工业化国家的劳动力总数当中，跨国工人所占的比例很少（4%）；但近几十年来，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工业化国家的移徙工人数量一直在不断增加。其中，进入美国的人数最多（占81%），其次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11%），欧盟占第三位。⁹ 跨国移徙者当中的女性比例不断攀升（2000年为49%），这反映出有越来越多的妇女开始为家庭赚取重要的收入。走出国门的移徙女工大多来自亚洲，她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从事家政和娱乐业，其次是护士和老师。¹⁰

尽管妇女在移徙者当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但按性别分列的国际移徙统计数据却很少，而且各国的数据也不一致。¹¹ 因此，各种调查不可避免地低估了那些没有证件以及以不正规方式从事工作的女性移徙者的数量，短期流动人数也有可能被低估了。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十分低下，家政工作不受重视，非正式及不定期的工作缺乏保护（娱乐业和接待行业的大多数工作都存在这种情况），以及从事（非法）卖淫活动，所有这些都说明很多妇女容易受到剥削。因此，性别问题不仅局限于劳动力移徙正式统计数据中的

男女划分情况，还应该考虑到对于标准性别角色、工作机会以及资源获取机会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

改变“移徙制度”：谁能进入？

移徙者的入境和居留要受各种规定和做法的制约，这就是“移徙制度”。尽管过去曾经拒绝接纳某些移徙者群体，但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所谓“定居国家”还是授予了大多数移徙者长期定居的权力。如今，来自亚洲（前往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移徙者，以及来自拉丁美洲（前往美国）的移徙者，已经改变了早先从欧洲前往“新大陆”的移徙模式。欧洲的情况有所不同。后殖民时代的政策允许输入临时劳工，但限制长期移民，从而形成了几类截然不同的移徙者：“定居者”、“外来劳工”和“殖民”移徙者。上述四个“定居”国家仍然欢迎大规模移民，而且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和获取公民身份方面，这四个国家的做法要比很多欧洲国家更加直接。

北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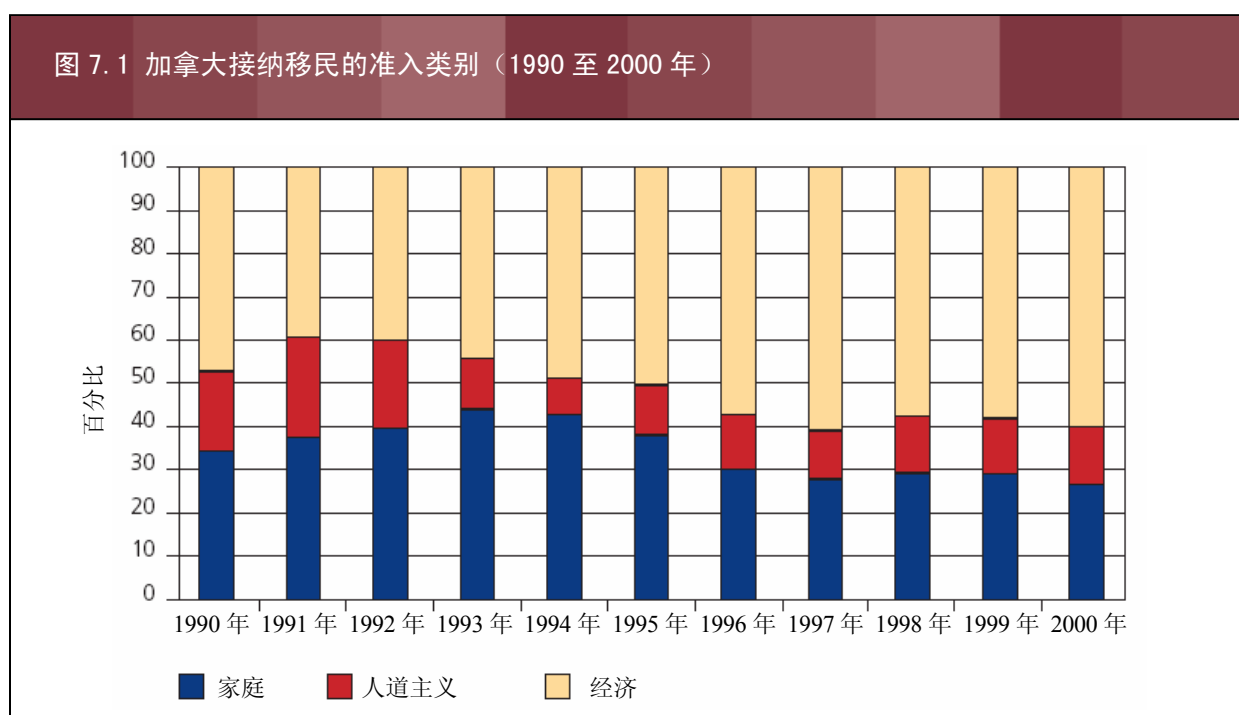
北美对于移民的态度近来发生了变化。在长期奉行的三项原则的基础上，加拿大和美国都允许外来者永久定居下来，这三项原则是：家庭团聚；经济贡献；人道主义考虑。目前的做法趋于

淡化这些“定居”原则，更多地考虑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决策者迫于压力，根据最有可能确保国民优势的人力资本特征来选择移民，用以满足本国的长期人口需求。为此，这些国家越来越倾向于采纳“外来工人”制度。

近年来，美国和加拿大的临时居民人数飞速增长，其中既包括熟练技术工人（比如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和信息技术工人），也有非技术工人（比如家庭护理人员 and 季节性农业工人）。被雇用的大多数人员都集中在熟练技术行业。人们普遍认为，具备熟练技术和文化程度较高的工人比较容易融入社会，而教育水平较低的移民会给国家财政造成负担。美国和加拿大近日都提出议案，给予非正规移民临时工人的身份，让这些人得到法律的承认。

将具备高技能的年轻移民锁定为授予永久定居权的目标群体，这种做法在加拿大最突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加拿大对多项法规进行了修改，对于以家庭团聚为目的的移民进行限制，强调吸收那些能够为经济做出贡献的人。到九十年代末，前往加拿大的绝大多数新移民均为“经济移民”及其直系家属（见图 7.1）。与此同时，尽管美国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一再呼吁修改移民政策，提高移民“质量”，但大多数入境者仍是以合法居民亲属的身份进入美国的（见图 7.2）。在美国，有很多政治和行政因素妨碍当局采纳更为严格的移民入境遴选标准，在两个政党出于竞选考虑而高度重视人数众多的西班牙裔群体时，相关讨论会蒙上政治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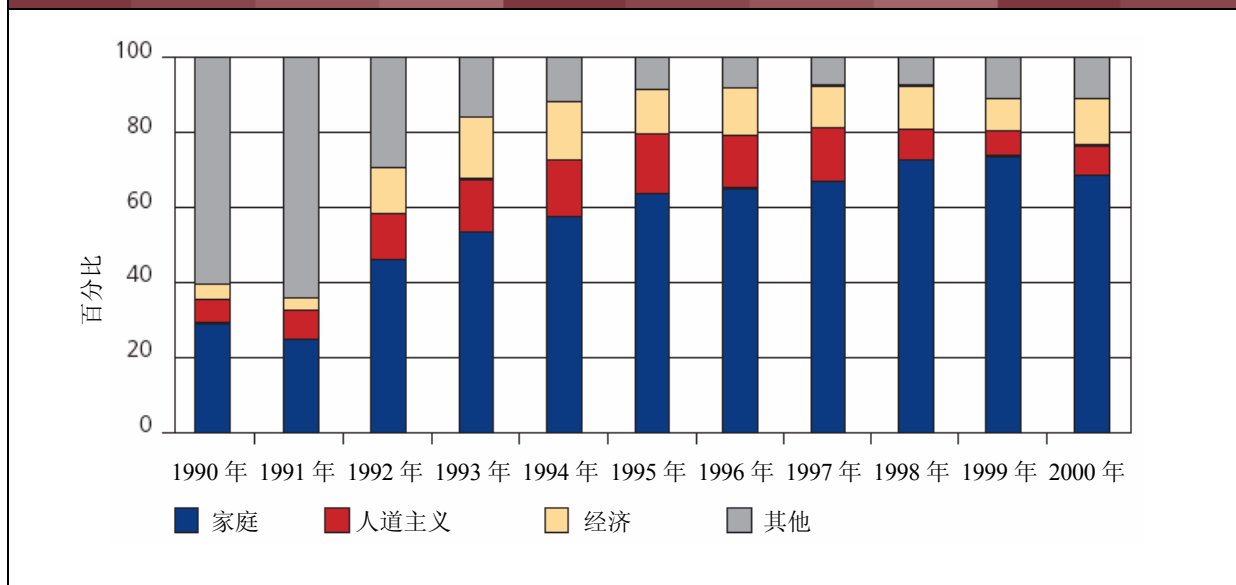
图 7.1 加拿大接纳移民的准入类别（1990 至 2000 年）



注：时间从 1 月 1 日到 12 月 31 日。

资料来源：加拿大供应和服务部，1991，1992，1996；加拿大公共工程和政府服务部，1994，1997，1998，1999 a，1999 b，2000，2001，转引自 Boyd 和 Pikkov，2004。

图 7.2 美国接纳移民的准入类别（1990 至 2000 年）



注：时间从 4 月 1 日到 3 月 31 日。

资料来源：美国国土安全部，2003，转引自 Boyd 和 Pikkov，2004。

欧洲

在欧洲，围绕移民所进行的讨论同样被赋予政治色彩；极右翼民粹主义分子强烈要求对限制移民入境，无论是出于工作的原因，还是为了家庭团聚或者寻求庇护。丹麦、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的右翼政党在不久前的选举中获胜，移民控制是这些国家首当其冲的政策领域之一。有几个国家近日已经出台立法，强化了移民制度中关于家庭团聚等方面的规定。在“9·11”事件之后，丹麦、法国和德国也相继推出或加强了强制性融合方案。要求“融合”和“同化”的压力日益增大，加深了针对穆斯林群体的怀疑，特别是有些人从穆斯林的两性关系出发，简单、错误地认为穆斯林敌视西方价值观。

在限制更加严格、惩罚措施更加严厉的移民

制度当中，熟练技术人员和非技术人员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前者受到欢迎，而后者的人数受到控制。有些国家为熟练技术人员的移民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措施：有权携带家属入境，家属有权工作，允许其永久定居并给予公民身份。德国新移民法和英国移民法等新的移民制度采用积分制。英国的积分制最重视收入、工作情况和教育水平。非技术工人以合同工人或外来工人身份入境，这些人不能定居，也没有权利携带家属。假如配额不足以满足雇主的需要，那么移徙工人则以非正规的强制方式入境。

亚洲国家

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接纳了来自周边贫困国家的数百万移徙工人，其中大多数为合同工人。大规模的工人移徙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从

那时开始，各国逐步采取措施，一方面控制移民流，同时为雇主提供大量灵活的劳动力。工人根据各自的技能进行分类：注册专业人员和高级技术工人；根据合同获准入境的非技术工人；既没有合同、也没有入境许可证的非法非技术工人。这种分类方法显然没有将基于人道主义原因的入境权利考虑在内。同欧洲和传统“定居”国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亚洲国家明确规定不允许非技术移徙者定居，也不允许其家人入境。

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香港（中国特别行政区）等地的多民族和多宗教社会是经由多年移徙逐渐形成的，尽管如此，维持族裔之间的平衡仍是这些社会目前采取严格移徙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泰国等一些国家，某些少数族裔甚至不得享有

完整的公民权。因此，大多数亚洲移徙者都不可能获得永久居留身份，要想获得公民身份更是痴人说梦。在多民族社会中，移徙者通常凭合同入境工作，其工作内容和年限均有明确规定。大韩民国和日本等族裔构成比较单一的东亚国家不允许非技术移徙者入境，有族裔关系者除外（比如在日本的“日裔”和韩国的华裔）。少数特定职业可以接纳来自国外的熟练技术工人。尽管日本和韩国政府严令禁止雇用非技术型外国工人，但多年来还是有 20 万至 30 万名非技术移徙者进入这两个国家，这些人或打着“培训项目”的合法幌子入境，或是在没有证件的情况下以非正规方式入境。

表 7.1 在家庭、人道主义和经济三个类别中，女性占入境移民总数的百分比⁽¹⁾
(1990 至 2000 年)

	加拿大 ⁽²⁾			美国 ⁽³⁾		
	家庭	人道主义	经济	家庭	人道主义	经济
1990 年	54.9	40.3	49.2	54.2	46.7	50.9
1991 年	56.0	38.5	50.2	54.8	48.1	50.3
1992 年	57.1	38.7	50.1	56.5	48.2	48.6
1993 年	58.0	42.6	51.6	56.4	49.0	47.7
1994 年	57.5	43.7	50.7	56.6	49.1	49.0
1995 年	58.3	43.1	49.5	56.9	48.5	49.5
1996 年	58.8	45.7	48.3	57.1	47.6	49.9
1997 年	59.8	44.6	47.8	57.6	46.8	49.2
1998 年	60.9	46.0	47.5	56.8	46.6	48.1
1999 年	61.2	45.9	47.1	57.4	48.7	49.5
2000 年	61.6	46.4	46.7	58.5	48.0	49.4

注：（1）例如，1990 年因家庭关系以移民身份（永久居民）获准进入加拿大的所有人员当中，妇女占 54.9%。

（2）日历年，从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3）财政年度，从 4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

资料来源：加拿大供应和服务部，1991，1992，1996；加拿大公共工程和政府服务部，1994，1997，1998，1999a，1999b，2000，2001；美国国土安全部，2003，转引自 Boyd 和 Pikkov，2004。

女工的入境模式

家庭团聚

在北美（表 7.1）和欧洲，以家庭团聚为入境目的的移徙者多以妇女为主，而在根据经济标准入境的移徙者当中，妇女人数还不到一半。这一结论是根据两性统计数据得出的，无论其作为主要申请者入境，还是作为家属入境。早些时候在北美进行的研究证实，出于人道主义原因或是符合经济标准而入境的妇女，多半是男性主要申请者的配偶或亲属。¹² 只有当劳动力流动以护士和家政工作等女性工作为目标时（见下文），妇女才会占到经济移徙者的大多数。由此可见，妇女的入境模式往往反应出她们作为妻子、女儿和照

理者的传统角色。

出于家庭原因的移徙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相关移徙研究对此却没有给予任何关注。这主要是由于女性的“从属地位”所致——人们通常认为，女性移徙者不会进入劳动力市场，也不会关心工作。事实上，研究人员对于女性的工作热情上一无所知。具有熟练技术的男性移徙者的人数正在不断增加，他们的妻子也很可能属于熟练技术工人，在这种情况下，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女性可能被排除在职场之外。近来，针对技术移徙者配偶的规定有所松动，但在其他地方获得的职业资格依然很难得到承认。

表 7.2 欧盟境内的家庭团聚受益人				
国家	配偶	子女	父母	其他
比利时	是	不满 18 岁的受抚养者		
丹麦	是 (包括同居伴侣)	不满 18 岁且同承担父母义务者生活在一起	60 岁以上的受赡养者	特殊原因
法国	是	不满 18 岁；欧洲宪章成员国则不满 21 岁	没有考虑	
德国	是	不满 16 岁的未婚子女；特殊情况下为不满 18 岁的子女	出于人道主义原因	
希腊	是	不满 18 岁的子女	受赡养者	
爱尔兰	是	视具体情况而定	取决于具体情况	视具体情况而定
意大利	是	不满 18 岁的受抚养者	受赡养者	成年子女
卢森堡	是	不满 18 岁的子女	是	成年子女
荷兰	是 (包括同居伴侣)	不满 18 岁的受抚养者	如果不能同家人团聚会造成困难	特殊情况下
葡萄牙	是	受抚养者	受赡养者	可能会考虑
西班牙	是	不满 18 岁的子女	受赡养者	成年子女
英国	是	未婚且不满 18 岁的受抚养者	受赡养的丧偶老人	特殊理由

资料来源：欧洲联盟委员会，2003。

欧盟和北美还规定,抱有移民目的的“家庭”须经国家认定。“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和不满18岁的子女,但通常不包括父母,除非父母需要子女赡养,或是处境艰难。这种做法缩小了家庭的范围,丝毫没有顾及到照料远方亲属的问题、家庭关系方面的文化差异、以及祖父母和其他亲属在养育和照料各类家庭成员方面所起的作用(见表7.2)。

庇护和难民移徙

另一个重要类别是基于人道主义的准入,对象是寻求庇护者和难民。相关法律和程序均采用不带任何性别色彩的语言,但这并不能保证实际结果的性别平等。得到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协助的难民营人口统计数据显示,在18至59岁年龄组,女性难民人数同男性难民人数相等,或多于对方;但整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进入美国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以及进入加拿大的难民当中,各年龄段的女性比例均不足50%(见表7.1)。假如采用主要申请者的数据进行计算,移民准入的性别差距更大。这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配偶和被抚养者均被排除在外。2000年,申请以难民身份进入加拿大的主要申请者当中,妇女仅占33%。2002年,在英国的绝大多数寻求庇护者都是男性(78%),但在难民地位申请的获准比例方面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在受理庇护或认定难民的过程中,可能不会考虑到性别方面的因素,比如容易受到性暴力侵害,因行为或着装而受到歧视。“难民”的定义不应含有任何性别色彩;但是,如果将性别歧视和脆弱性等问题排除在外,就等同于偏向男性。女性政治活动往往局限在私人领域,比如对于持不同政见者给予家庭支持,此类活动不太可能导致迫害。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已经在受理

庇护的过程中采用了性别迫害指南,丹麦、德国、爱尔兰、挪威、瑞典、英国等欧洲各国纷纷效仿。挪威和瑞典推行积极政策,为需要重新安置的妇女提供旅费补助,并采用包括脆弱性和政治迫害在内的甄选标准;英国也正在审议类似的提案。

难民安置国往往会在基本资格标准之外附加入境标准。这种做法反映出人们的种种忧虑:难民不应带来卫生或安全威胁;难民不应要求广泛、长期的社会援助。在大多数情况下,符合资格要求是入境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此外还要取决于教育、工作技能和实现经济自立的潜力。大多数社会常见的性别划分意味着妇女的教育程度、技能和工作经验通常都不如男性;因此,妇女要满足“自立”标准,很可能会比较困难。1988年,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要求加拿大在保护和重新安置弱势女性难民的问题上给予具体协助,加拿大为此制订了“危机中的妇女”试点方案。迄今为止,该方案只接纳了为数不多的女性难民。自获准入境以来,只有2250名妇女及其受抚养者得到了安置。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是由于经济融合的实际困难、要求的时间框架较长、以及私人基金会和国际基金会为照料这些人支付了巨额费用。¹³

东亚和东南亚的发展趋势

北美和欧洲通常将女性移徙者视为“受抚养者”,但在东亚和东南亚,绝大多数妇女以独立工作者的身份从事移徙活动,她们中有些人是单身妇女,有些人则是抛夫弃子的已婚妇女。在亚洲妇女当中日益普遍的一种移徙渠道是“婚姻移徙”。婚姻可能是劳工移徙的结果,比如餐饮业或娱乐业的工作者同东道国的顾客结婚;也可能只是一种目的,比如“邮购新娘”。¹⁴ 东亚跨国婚姻的增长势头迅猛,绝大多数婚姻都是由本地男

性（日本、大韩民国、中国台湾省）和来自东南亚的女性结合。为此，东南亚各国政府正在重新审议本国有关居留和公民身份的规定。新加坡法律禁止非技术型外国家政工人同本地男子结婚。

正如上文所述，亚洲的移民目的地国家不承认家庭团聚可以作为移民的标准。基于人道主义（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而被正式接纳的移民数量极少。表 7.3 显示出 1979 至 1996 年间，亚洲四大输出国女性移民工人的外流情况；这些女性大多是住在雇主家中的家政工作者。数据显示，这些国家的移民女性化现象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当时斯里兰卡向海外派遣了大量家政女工，

其中大多数前往中东地区。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其他国家也开始加入这股移民流，妇女在外流移民工人中所占的比率高达 70%，她们在中东、欧洲、北美和大洋洲等地找到了工作。

表 7.4 表明亚洲劳动力输入国的移民妇女情况，按国家分别列出了从事各种行业的女性移民者人数及其在移民者总数当中所占的比例。截止到 2002 年，至少有 130 万外国妇女在七大劳动力输入国及地区工作：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中国台湾省、香港（中国特别行政区）、大韩民国和日本。在有些国家，这些妇女在全体移民劳动力当中所占的比例相当高。

表 7.3 输出国的女性移民者人数以及女性在总输出人数中所占的百分比（1979 至 1996 年）								
	斯里兰卡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		泰国	
	总数	女性%	总数	女性%	总数	女性%	总数	女性%
1979 年	12 251	47.3	—	—	—	—	—	—
1980 年	14 529	50.8	—	—	3 862	18.0	—	—
1981 年	30 135	52.5	—	—	—	—	—	—
1982 年	5 400	24.0	—	—	—	—	—	—
1983 年	7 819	43.2	12 018	48.4	—	—	—	—
1984 年	5 762	36.7	20 425	48.0	—	—	—	—
1985 年	11 792	95.1	39 960	49.4	—	—	—	—
1986 年	5 150	31.4	39 078	47.7	—	—	7 194	6.4
1987 年	5 474	34.0	44 291	49.0	180 441	47.2	9 752	9.2
1988 年	10 119	54.9	49 586	48.6	—	—	15 062	12.7
1989 年	16 044	58.4	—	—	—	—	—	—
1990 年	27 248	63.9	—	—	—	—	—	—
1991 年	43 612	67.0	—	—	—	—	—	—
1992 年	29 159	65.3	—	—	—	—	—	—
1993 年	31 600	64.8	85 696	66.0	138 242*	54.0	41 830	19.4
1994 年	43 796	72.8	—	—	153 504*	59.2	—	—
1995 年	125 988	73.3	—	—	124 822*	58.3	31 586	15.6
1996 年	119 456	73.5	—	—	111 487*	54.2	28 642	13.3

注：* 代表最近受雇人数。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2003，转引自 Yamanaka 和 Piper，2004。

非正规移徙

正如表 7.4 所示，非正规或未经批准的移徙者在亚洲国家数量众多。造成这种现象，是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而且邻国国民之间有着共同的历史、语言和宗教。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之间的边境一直以来防备松懈，泰国、缅甸、老挝、越南和柬埔寨边境也是如此。目前尚未得到可靠的资料，但这一地区未经批准的工人总数估计在 150 万至 200 万之间。针对东南亚无证件移徙现象进行的研究发现，有大量移徙妇女来自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和老挝，她们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享受不到任何法律保障，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其中包括家政工人、小商贩、种植园工人、工厂工人、建筑工人和养鱼场帮工。泰国和缅甸的边境地区聚集着很多妇女，大多为少数族裔，从事卖淫活动。¹⁵ 这些妇女的处境从本质上违背了相关法律和人权，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因此在这一地区蓬勃发展起来。¹⁶

未经批准的劳工往往从美国和墨西哥边界进入北美。在美墨边境地区，移徙者要面对更为恶劣的歧视和困境。美国的非正规人口估计为 930 万，占美国侨民总数的四分之一强，其中 41% 为妇女。人们通常认为，有很大一部分人是由于申请文件积压才沦为非正规劳工的，有些家庭成员要等上 10 年才能拿到签证。加入劳动力大军的男女比例估计分别为 96% 和 62%。这 600 万工作人口占劳动力总数的 5%，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率为 10%。¹⁷ 这些工人的工资较低，其中三分之二的工人的薪水还不足最低工资的两倍。

由于移徙工人浪潮在美国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于是有关方面勉强形成了政治共识，至少给部分无证件移徙群体授予某种形式的合法地位。乔治·W. 布什总统在 2004 年提出的移民政

策改革建议及其合法化方案同欧洲的外来工人政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很有可能导致合法居民的低人一等的地位形成制度化。

贩运人口

贩运人口是最臭名昭著的非正规移徙形式之一，以性剥削为目的的贩运人口往往会严重侵犯人权。贩运人口并非新生现象，而且同其他移徙流动一样，贩运人口现象的规模不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移徙与贩运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种自主选择，而后者则是以强迫、欺骗和暴力形式实现的。然而，在当今经济日趋全球化和流动自由受到严格限制的情况下，跨境贩运人口和移徙活动相互混杂在一起。此外，战争和冲突局势往往会导致贩运人口现象激增（见第十三章）。

贩运人口的定义是一个棘手问题，人们往往根据各自不同的利益、观点和政策目的，给予不同的解释。关于非强迫性成年人移徙卖淫是否应该包括在内，各方观点不一。假如贩运人口的定义过于狭窄，可能会掩盖迫使移徙妇女从事性行业的各种不同压力。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很少有移徙妇女属于纯粹的受害者。许多人在移徙之前就十分清楚自己工作目的地的情况，即便是由于经济和社会环境所迫才做出这种选择，但她们还是给予了积极的配合。这些妇女需要得到法律地位和就业权利，以便摆脱商业卖淫活动，转而从事其他类型的工作。通行的贩运人口定义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只注重性剥削，忽略了与工作有关的人口贩运活动的其他目的。

假如出现跨境流动，目的地国家普遍将贩运人口视为非法移民问题进行处理。这种做法的危险在于，关注重点从违反人权问题转移到非法入境及滞留上，因此，最终被视为“受害者”的是接收国，而不是被贩运者。

表 7.4 21 世纪初非技术型移徙妇女在接收国的职业、移民地位、原籍国家、人数及其占总人数的百分比

国家/经济体	主要职业	移民地位	原籍国	妇女人数	妇女占总人数的%
新加坡	家政工人	合同工	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	140 000	43.8
马来西亚	家政工人	合同工	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162 000	20.5
		未经批准的移徙者		—	—
泰国	家政工人	登记的移徙者	缅甸、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柬埔寨	244 000	43.0
		未经批准的移徙者		—	—
香港（中国特别行政区）	家政工人	合同工	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斯里兰卡、尼泊尔、印度和其他	201 000	70.0
中国台湾省	家政工人，看护人员	合同工	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	170 000	56.0
大韩民国	工厂工人	行业培训人员	中国、菲律宾、越南、蒙古、泰国和其他	35 000	35.1
		未经批准的移徙者		—	—
	服务人员	未经批准的移徙者	中国朝鲜族、中国人	43 000	—
	娱乐业人员	娱乐业人员	菲律宾、俄罗斯	5 000	—
	未知	未经批准的移徙者	泰国、蒙古和其他	19 000	—
	外国妻子	公民的配偶	中国、菲律宾、泰国	57 000*	—
日本	工厂工人	长期居民	巴西、秘鲁	120 000	45.1
	娱乐业人员	娱乐业人员	菲律宾、俄罗斯、大韩民国	40 000	84.1
	未知	未经批准的移徙者	大韩民国、菲律宾、泰国、中国	106 000	47.3
	外国妻子	公民配偶	中国、菲律宾、大韩民国、泰国	89 000**	—

注：* 2000 年和 2001 年的总数。

** 1989 至 1999 年的总数。

资料来源：Huang 和 Yeoh, 2003; Chin, 2003; Tantiwiranond, 2002; 香港政府统计处, 2002; Lan, 2003; Lee, 2003; Yamanaka, 2003; 转引自 Yamanaka 和 Piper, 2004。

这是出于这个原因，某些目的地国家近来制订了受害者支持体系，要求妇女出庭作证，在法庭上指认其贩卖者，以取得居留证。但是，临时居留并不能给相关妇女带来长期安全保障。将移徙妇女卖淫问题同关于非法移民问题的讨论混为一谈，往往会导致后者占上风，致使许多妇女在被发现卖淫之后遭到驱逐出境。因此，有些国家的政府不愿将外国性工作者的存在合法化，因为这将被视为对非法移民的鼓励。¹⁸

没有证件的移徙者面临着最残酷的现实，他们只要犯下任何一点轻微的违法行为，就会立即遭到驱逐。不仅被贩运妇女是如此，那些遭受雇主或配偶殴打的无证件妇女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在美国，受虐待妇女权益的支持者向美国国会施加压力，迫使其在 1994 年《针对妇女暴力法案》中增加了一条规定，给那些受到（合法定居）配偶殴打的无证件移民妇女颁发绿卡，并允许她们在丈夫不知情的情况下申请永久居留权。到

2001年,已有17 907名妇女根据这一条款提出永久居留申请。遭受性剥削的被贩运妇女所在的目的地国也开始实施受害者支持方案,并提供特殊的签证类别,允许得到确认的受害者推迟、甚至避免被驱逐处境,意大利就是一个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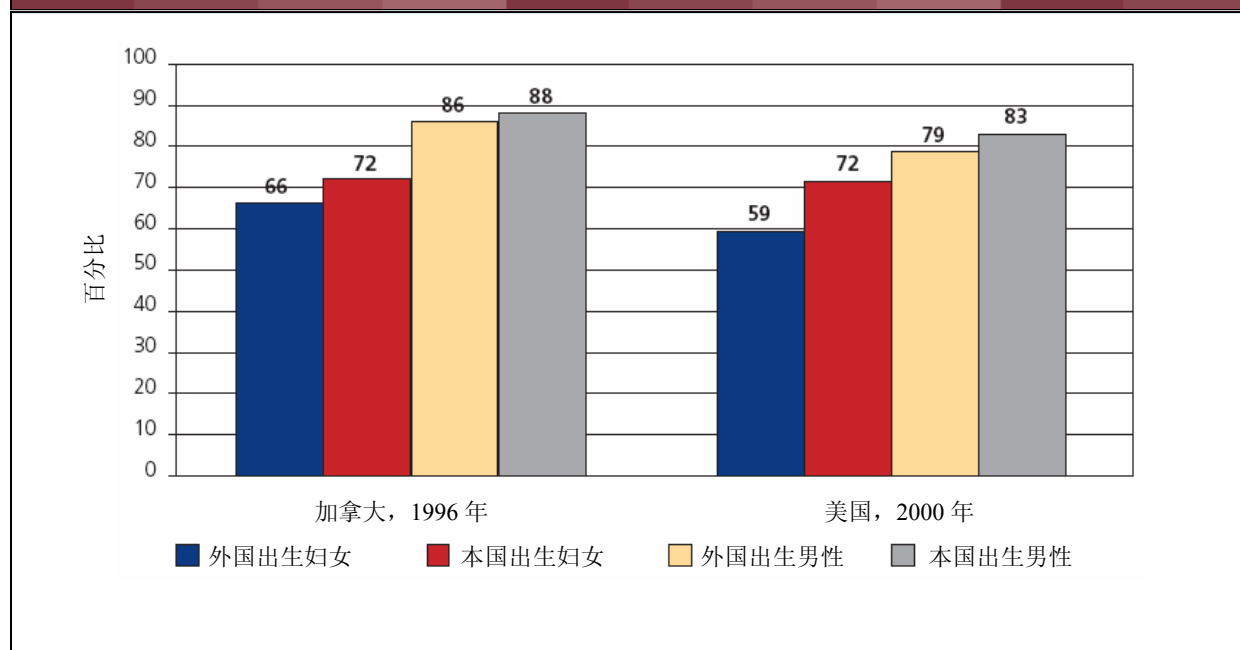
劳动力市场的分化

移徙妇女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比例较低,她们从事的工作社会地位低下,劳动条件差,收入低(见图7.3和表7.5)。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北美国根据出生地和性别划分的所有群体中,国外出生的妇女成为正式劳动力的可能性最低。¹⁹某些外国妇女,包括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属于技术熟练工人,但这部分人却大量集中在服务、零售和制造等行业的最底层。非洲、拉丁美洲和

西班牙裔妇女从事低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的可能性最高。²⁰

在北欧,移徙妇女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比例近年来有所上升,但是仍然低于本国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各国内部存在着严重的民族差异。从挪威的统计数据来看,难民妇女要进入劳动力市场非常困难,参与劳动力市场计划的女性人数少于男性。²¹很多国家禁止寻求庇护者就业,至少在最初阶段不行。寻求庇护的非主要申请者同样很难获得工作的权利。难民通常会遭遇文化和语言障碍、种族歧视和偏见,他们的各种资格得不到承认。除此之外,女性难民还承担着照料子女的额外负担,男性家庭成员可能会反对她们外出工作。

图 7.3 加拿大(1996年)和美国(2000年)按性别分列的25至64年龄段外国出生人口与本国出生人口在劳动力中所占百分比



资料来源:根据加拿大统计局1996年数据和美国人口调查局2000年数据计算,转引自Boyd和Pikkov, 2004。

表 7.5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某些成员国按性别分列的 2001 至 2002 年国民及外国人平均就业率和失业率

	就业率				失业率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国民	外国人	国民	外国人	国民	外国人	国民	外国人
奥地利	78.7	84.6	63.2	63.1	4.0	9.3	4.0	8.2
比利时	72.8	71.2	56.2	42.7	5.1	14.3	6.6	17.8
捷克共和国	78.5	84.1	62.8	61.6	6.3	9.1	9.1	13.2
法国	75.2	76.1	63.4	48.4	6.7	16.6	9.6	21.0
德国	78.9	77.6	65.2	51.5	7.7	13.7	7.7	12.1
希腊	75.8	89.4	49.1	57.8	6.6	6.9	15.2	16.1
匈牙利 (2001 年)	67.5	77.3	52.4	53.1	6.3	2.2	5.0	7.7
冰岛	78.8	77.3	56.7	56.4	4.3	4.9	3.6	5.5
卢森堡	73.0	81.8	48.4	59.1	1.3	2.4	1.9	4.2
荷兰	85.3	68.9	68.1	52.1	2.0	4.4	2.6	5.0
西班牙	78.3	88.3	51.2	63.8	7.4	11.4	15.7	17.0
瑞典	80.5	71.0	76.9	60.4	4.9	12.1	4.3	9.3
瑞士	88.8	89.6	74.1	71.2	1.7	4.6	2.6	6.2
英国	82.7	76.4	68.7	56.3	5.3	8.4	4.1	7.5
澳大利亚 (2001 年) ⁽¹⁾	81.7	77.8	67.6	59.3	7.8	8.6	6.2	8.1
加拿大 (2001 年) ⁽¹⁾	73.9	68.7	62.3	54.6	7.8	6.8	7.0	8.1
美国 ⁽¹⁾	82.0	86.5	72.2	62.6	6.0	5.6	4.7	6.3

注：以 15 至 64 岁年龄段的劳动力为计算基础，加拿大（15 岁以上）和美国（16 至 64 岁）除外。

(1) 本国出生和外国出生人口。

资料来源：OECD，2004b。

移民家庭的子女较多，适合妇女的工作类型受到文化制约，这些因素或许可以解释不同群体之间的上述差异，但劳动参与率如此之低反映出了找工作的困难和现有工作的质量。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妇女就业率上升，特别是在瑞典和法国等国，抚养幼儿的母亲从事着全日制工作，这对于儿童保育和其他社会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家庭成员、特别是孩子的祖母可以提供重要的非正式支持，但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各种渠道利用正式服务，比如公共

部门、市场或正规性稍差的社区网络。

工资低且没有保障的工作大多产生于服务部门，当政府将社会服务责任推给私营部门、社区或志愿组织时，情况更是如此。在新全球经济当中，男女的工作走向各不相同。男性往往在全球金融、生产和技术等高科技领域身居高位，占据“知识经济”的制高点。男性可以比较轻松地进入跨国公司、信息技术行业和科技部门；而妇女负责提供类似于传统妻子角色的服务：照顾子女与老人、做家务以及充当性工具。虽然技术型劳

动力当中不乏妇女，但信息技术等行业要求从业人员经常往来于不同工作地点，移徙女性很难做到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移徙妇女满足了发达经济体的保育行业不断增长的需求，帮助这些国家在福利受到限制和劳动力灵活流动的新自由主义条件下实现了经济增长。²² 移徙妇女以有偿、无偿、正式或非正式方式照料着老人、儿童和残疾人，然而在谈及保育经济和福利国家的变化时，却很少有人提到她们的作用。²³ 在某些国家，大量移徙劳动力就职于学校、医院、养老院和儿童保育中心。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英国，教育和卫生行业的移徙妇女就业率最高。在瑞典，从事这两个行业的移徙妇女人数占 2001 至 2002 年移徙妇女就业总数的 27%，芬兰和英国的这一比率为

22%。欧洲其他国家的这一比率则要低得多：法国为 8%，德国为 10%，西班牙为 5%。

对于家务劳动和家庭保育而言，最普遍的问题是工资低，工作时间长，家政工人地位低下，同雇主之间的私人化关系使得家政工人难以通过谈判方式争取到合理、及时的付款和休假。年轻的家政工人遭受剥削的可能性更大，特别是不满法定工作年龄者。家庭的卫生和安全状况可能不尽如意，家政工人可能会丧失教育和个人发展的机会；如果生病，还可能拿不到工资，甚至失去工作。此外，这些家政工人还可能遭受身心摧残和性虐待。由于家政工作通常不属于劳动法的管辖范围，获得补偿的机会很小。香港（中国特别行政区）、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台湾省等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国家及地区均承认以获取签证为目

方框 7.2 来自边缘地区的定期移徙工人如何往返两地为生活优裕的精英们提供服务

艾娃是一位单身母亲，住在靠近白俄罗斯边境的一座波兰小城——西米亚缇兹。在过去的 7 年里，她一直往返于西米亚缇兹和布鲁塞尔之间，每次在布鲁塞尔呆上 4 个月。艾娃有一个 12 岁的儿子，她同自己的母亲同做一份工作。母女两人轮流为布鲁塞尔的雇主操持家务，她们的工作包括洗衣、做饭、照料孩子以及跑腿，以便让雇主能够腾出时间从事休闲活动，或是专心工作。

在西米亚缇兹市，有数千人定期前往布鲁塞尔，为西欧上层社会的精英分子提供大批廉价、不定期的劳动力。由于家乡没有工作机会，以及东西欧之间巨大的财富差距，促使人们纷纷外出寻求工作。目前没有官方统计，但这座有 16 000 名居民的小城约有 5 000 人常年在布鲁塞尔及其周边地区工作。

像艾娃母女这样几个人共同承担一份工作的家庭很多，这些妇女远离家园，牺牲了完整的家庭生活。但是赚钱太重要了，她们不能放弃工作。她们乘公共汽车要花 22 个小时才能抵达目的地，在随后的 4 个月中，她们能赚到 3 000 英镑，相当于在家乡工作两年的收入，而且还是在有工作的情况下。艾娃的姐妹和她们的丈夫、她的二个哥哥和嫂子每年都会有一次或两次行程上千英里，到异国他乡从事类似的工作。艾娃对自己的雇主赞赏有加：“他们对我真的很好，我不想换地方。”

关于从新加入欧盟的国家流向富裕国家的移徙者人数的预测显得有些大惊小怪，其中很多纯属子虚乌有。但布鲁塞尔预计，由于欧洲人口不断下降，新欧洲的劳动适龄人口将在 20 年内减少 2 000 万人，移民劳工的涌入是必然趋势。另一方面，波兰下层民众为西欧精英提供服务的现象由来已久，短时间内不可能发生改变。

资料来源：Traynor, 2004。

的的家政工作，但除香港（中国特别行政区外）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将家政工作明确排除在劳工标准之外。

具有高中学历、甚至具有大学文凭的移徙妇女从事着非技术性工作，她们的资格得不到承认。对于来自菲律宾、东欧和拉丁美洲的妇女来说，这种情况尤其严重。她们当中有很多人以学生或游客身份前往接收国，而后逾期滞留。合法与违法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这是美洲和东南亚女工的真实写照；东欧妇女在接收国的居住时间最长可达3个月，她们通常几个人轮流做一份工作（见方框7.2）。²⁴

德国规定，从2002年2月开始，假如德国家庭中有一名家庭成员需要照料，而且该家庭享受国家护理保险系统的福利，欧盟新成员国的公民便可以合法身份在该家庭中工作三年。这些护理人员属于合法就业，并且按照德国工资水平得到报酬；但德国法律规定，这些外来劳工不得与在德国接受培训的家庭护理人员竞争工作岗位，他们的工作许可证上必须写明“家庭帮工”。这种规定其实是在暗示“未经培训的外国工人”可能会给被照料者带来风险，实际上是对外国工人技术的否定。以此种方式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同信息技术产业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信息技术产业中，外籍工人和德国人以同等标准实现就业。

移徙妇女的资格可能得不到认可，超负荷的工作量可能让她们身心疲惫，但她们本人及其家庭的社会地位在家乡往往会上升。有几项研究深入分析了某些移徙劳工所面临的这种自相矛盾的阶层地位，研究工作的重点放在菲律宾和东欧国家受过良好教育的移徙者身上。移徙者可能会同时经历社会地位的提升和下跌。在目的地受到歧

视，技术被贬低；而在家乡，他们寄回的汇款可以用以小本生意、兴建住房和儿童教育，社会地位因此得以提升。这两者或许可以相互抵消。

移徙卫生工作者

纵观历史，妇女大多从事福利和社会领域的工作（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2000年英国工作许可数据分析显示，女性比例较高的部门已经成为移徙者就业人数增加最快的部门。英国、爱尔兰、加拿大和美国护理行业所面临的危机造就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劳动力市场。菲律宾向海外输送的护士人数最多，其次是加纳、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吸引她们前往发达国家的不仅是对未来高收入的憧憬，本国卫生行业的状况也是迫使她们远走他乡的一个重要因素（见第八章）。爱尔兰对于外籍护士的依赖程度相当严重，尤以菲律宾护士的人数最多。为解决技术和人才外流问题，英国正在制订一部行为守则，用以规范外籍卫生工作者的招聘事宜。但这部守则能否在私营部门推行，还是个未知数。

针对英国国际护理人员的一项研究发现，这些人大多来自欧洲、澳大利亚、非洲和菲律宾，其中有很多人认为自己的技术没有得到重视和尊重，地位被贬低，而且还要面对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国家卫生服务系统和私营独立部门对待这些劳工的态度有着很大差别，前者能够比较积极地看待他们，后者则常常将他们视为护理帮工。²⁵

针对北美地区外籍护士处境的类似调查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她们在国外的工资或许高于原籍国的薪水，但也极有可能受到剥削。在通常情况下，这些外籍护士受雇从事护理助手的工作，而不是作为注册护士，她们面临着工资低、晋升机会少、被开除的风险高等各种形式的歧视，而

且往往被派往工作压力很大的部门。²⁶ 近年来，在外国护士的需求量不断增加的同时，卫生保健系统开始进行改革，这有可能使得外籍护士的工作条件进一步恶化，降低她们的工资，对病患护理行业产生不利影响。在美国，缺少护理人员的医院大多是位于市中心的市立医院。

加拿大规定，要获得专业人员资格就必须申请执照，并接受二次认证，包括护士在内的所有高学历移民劳工都面临这个问题。贸易、法律、工程技术、卫生等领域的受控职业需要拿到法定认证或执照，主要方法是通过行业协会。这样做的目的是维持行业标准，确保公共卫生和安全，但这种做法同时也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化，只要控制劳动力供应便可以形成垄断。在加拿大，认证要求可以被视为一种制度歧视。认证标准同样适用于加拿大本国人和外籍工人，但严格限制外籍工人进入某些行业和职业。学位证书贬值是制度歧视的一种体现，加拿大行业协会不承认外国学位同本国学位具有同等的效力。

护理业最受关注，但并不是缺乏卫生专业人员的惟一一个领域。在英国，海外医生（未经欧洲经济区认证的医生）在医院医生总数当中占很大比例；2000年，这一比例为26%。在日益呈现女性化特征的行业中，女性移徙医生占有很大比例；1998年在医师总理事会注册的移徙医生当中，有一半以上都是妇女。大多数妇女被委以中、低级职位，她们正在设法获得更高的资格和更多的培训。

技术型移徙妇女即便不想定居下来，仍有可能续签合同，最终取得公民权，并把家人接来团聚；非技术型妇女则享受不到这些权利。由此看来，摆在女性面前的技术性移徙的机会虽少，但这种机会的增多却说明了移徙方式和潜在权利的多样性。

注释

- 1 例证，见 Hugo et al., 2003。
- 2 Castles, 2003; Kofman, 2004。
- 3 Milanovic, 2003; 另见 IDEAS, 2002。
- 4 IOM, 2004。
- 5 Newland, 2003。
- 6 Chant and Radcliffe, 1992。
- 7 Asis, Huang and Yeoh, 2004。
- 8 Collins and Rau, 2000。
- 9 ILO, 2004f:5。
- 10 ILO, 2004f:10-11; Yamanaka and Piper, 2004。
- 11 Zlotnik, 2003。
- 12 Boyd, 1992; Freedman, 2003a。
- 13 Boyd and Pikkov, 2004。
- 14 Piper and Rocas, 2003。
- 15 Battistella and Asis, 2003; Asia Watch and Women's Rights Project, 1993。
- 16 Piper, 2003, 2004。
- 17 Jimenez, 2003。
- 18 Gallagher, 2001; Freedman, 2003b; Piper, 2004。
- 19 Bean and Stevens, 2003; Schoeni, 1998。
- 20 Boyd, 2001; Shumway and Cooke, 1998; Wright and Ellis, 2000。
- 21 Hauge Byberg, 2002。
- 22 Ehrenreich and Hochschild, 2003; Hochschild, 2000; Sassen, 2000。
- 23 Williams, 2003。
- 24 Morokvasic, 1996。
- 25 Allan and Aggergaard Larsen, 2003。
- 26 Stasiulis and Bakan, 2003。